



国学小史

梁启超 著
夏晓虹 陆胤 校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夏晓虹 主编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梁启超 著
夏晓虹 陆胤 校

国学小史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夏晓虹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小史/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ISBN 978-7-100-09758-1

I. ①国… II. ①梁… ②夏… ③陆… III. ①国学—研究—
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640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国学小史

梁启超 著

夏晓虹 陆胤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58-1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½ 插页 2

定价: 35.00 元

总 序

夏晓虹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他对清末民初那代人的深刻影响,早经身历者不断叙说;即使时至今日,其著作征引率之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名列前茅。

以治学而言,梁启超的兴趣广博,涉猎门类极多,后人因此称之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不过,在诸般学问中,其最钟情者显然是史学。晚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学,时为学生、后亦成著名学者的姚名达向导师请教:“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梁启超毫不犹豫地答道:“史也,史也!”(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无疑是以金针度人。

从前期的投身政治活动,到后期的倾力讲学著述,梁启超无论是以政论家还是学者的身份撰著,其史学底蕴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探究中国富强之道,梁启超即将命题转换为《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从救国方略考量,居日期间,梁氏不免特重社会科学,尤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多用功夫。问题意识虽集注于当下,论题却可以从上古说起。于是,要论证专制政体有害于中国,便写下《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欲将中国改造成为法治国,“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也必要先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及其姊妹篇《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为谋

求币制改革,“以促政府及国民之警醒”,故撰《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甚至完成一篇《中国古代币材考》,亦自辩并非“玩物丧志”,而“归结于今日中国之必当用金以为主币”。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其借镜实在西方。并无多少外语优势的梁氏,介绍起西方学说,也照样力图从头说起,著作中因此留下《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改题《论希腊古代学术》)、《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格致学沿革考略》等未竟之篇,在在透显出作者的史学癖好。

而这种以现实政治为标的的历史考察,即使在学术论著中也时有流露。1902年发表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被胡适推许为“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四十自述·在上海(一)》)。此篇原与《新民说》一同在《新民丛报》刊出,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清理,于是也和“新民”之道发生关联。“新学术”既可以作为“新民”利器,篇中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与对学术专制的抨击亦与其政论相呼应,构成了这部学术史的主线。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梁启超在此时期提出的“新史学”观。梁氏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而旧史学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达成上述目标。梁启超因此大声呼唤“史界革命”,并身体力行,对旧史学进行了犀利的清算。而这些“在当时真能言人所不敢言”的批判,“虽相隔三十几年”,仍然让其清华国学院高足、历史学家杨鸿烈在写作《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时,“觉得非常的‘淋漓痛快’”(第三章《史学的“今”与“昔”》)。“新史学”明确主张为国民著史,为今人著史,以研究历史进化规律为职志。由此而引发的学术思潮,也在中国史学界经久不息地回荡。

推究“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实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即史学自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从1902年撰写的《新史学》所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学之界说》);到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学的重新界定:“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一以贯之的正是科学精神。而对纷纭的历史表象背后复杂的文化成因的探求,始终是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动力。这种努力,用梁氏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总结的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所谓“求得真事实”(《总论》第一章《史的目的》)来概括,亦精要传神。

科学精神又不只体现在对史学终极目的的探求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已然论及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即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文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实际上,“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史学之界说》),也正是梁启超在史学界努力开拓的新局面。1901年写作的《中国史叙论》总共八节,其中便有一节谈“地势”,一节谈“人种”,实乃“新史学”观的提前预演。不满足于传统考据学的琐碎,借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手段,梁启超期望获致的是一种宏观、深邃的视野。尽管这些学科间的互融不乏日本学界先在的诱导,但毫无疑问,梁启超对此始终满怀兴致。早年热衷于人文地理学,作《中国地理大势论》;晚年又将统计学引入史学研究,成《历史统计学》。其不断出新的探索,开史学研究众多法门,也给后来者以无穷启示。而梁氏毕生治史的经验,部分留存在两本《中国历史研

究法》中,让一代代后人汲引不尽。

不过,历史科学对于梁启超来说,从来不是单纯的学问,而必定有致用的诉求。早年欲著《中国通史》,意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三十自述》);晚年不断讨论“史之意义”与“史的目的”,最后均落实到“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史的目的》)。除去在社会活动方面具有鉴往知来的意义,梁启超的特别之处在于,重视读史对个人人格修养的陶铸之功。这在1920年代的史学著述中表现尤其明显。既然“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国学研究又被区划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指点古代典籍的阅读门径时,便往往兼具“为修养受用”与“为学术的研究”二重目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更是特意添加上“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的别样标题,以凸显该书在人生哲学方面的特别用心。其间固然有早年熟读朱王学说留下的印迹,但1920年欧游归来后,发愿以中国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念想也不容忽视。

以梁启超的眼光、气魄,独立修撰一部《中国通史》,乃是其念念不忘、也有望成功的一桩志业。从1901年起意,到1925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文化史”,其间,梁氏几次试笔书写,并将通史的计划扩展成为文化史,却均因各种缘故而最终放弃。这自然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而其存留至今的两份1920年代所拟目录,《中国通史》计分三部三十三篇,《中国文化史》拟分二十五篇,格局阔大,却又巨细靡遗,章目之间,尽显现代史学精神。即使面对这些残页,也足以令人惊讶、钦佩任公先生纵横各学科之博学无涯。

相比于两部大史的完成篇目无多,清点梁启超的史学著述,最

成系统与规模者当属学术史。从最初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后来的《中国学术史》（包括《中国佛学史》、《清代学术概论》）、《国学小史》（初名《中国学术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诸作，梁启超涵括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学五部的《中国学术史》，大致成稿近半。这笔丰厚的遗产，当年曾嘉惠无数学子，今日仍不失为值得反复研读的学术经典。

有这样骄人的史学业绩，梁启超生前的自期，“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已完全应验。而最新统计中，《饮冰室合集》在近十年历史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中排名第一（见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足以让我们体悟，梁启超的史学影响不仅未尝消减，反而历久弥深。

反观此前出版的各种梁启超史学著作，尚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未保持初版样貌，取消或改变了原有标点，或者在版本选择与校勘方面多有不足。为此，实有必要进行重新整理。

今次拟精选梁启超重要史著若干种重行整编。其工作原则，一是尽可能恢复梁启超的最初构想，将在《饮冰室合集》中分散的篇目加以归整，如使用上列《中国学术史》与《国学小史》的命名，而合并原先独立的成书（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等）与散落的论文；二是尽可能选择最早或最完整的版本（包括手稿与报刊）作底本，同时以其他有价值的版本参校，并注明各版异同；三是尽可能保留原作者的标点和用字习惯。目的是提供一套精良的梁启超史学著作读本，以方便学界使用和一般读者阅读。

2013年10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导读：“失而复得”的《国学小史》	夏晓虹 1
校订说明	40

第一篇 先秦

第一章 前论	45
第一节 孔子以前之书籍	45
第二节 古代思想之根核	46
第三节 孔子以前之社会情状	50
第二章 诸子总论	53
第一节 诸子考	53
一、诸子年代	53
二、诸子人名及其著述	54
第二节 诸子勃兴之原因	58
(甲) 外的原因	58
(乙) 内的原因	60

现存子书及其真伪	61
(甲) 真书	61
(乙) 伪书	62
附:先秦诸子表	64
 第三章 老子	71
第一节 老子的传记	71
第二节 老子的学说	72
第一 本体论	73
第二 名相论	80
第三 作用论	86
 第四章 孔子	99
第一节 孔子事迹及其时代	99
一、孔子事迹	99
二、孔子所处之环境	101
第二节 研究孔子学说所根据之资料	103
第三节 孔学提纲	107
一、学	107
二、一贯 忠恕	109
三、仁 君子	111
四、(原缺)	113
五、礼	113

六、乐	120
七、名	122
八、性命	125
九、鬼神祭祀	128
第四节 孔子之哲理论与《易》	130
一、易体	131
二、卦与象	134
三、爻与辞	137
四、繁变与易简	142
第五节 孔子之政治论与《春秋》	145
一、大同与小康	145
二、《春秋》的性质	148
三、《春秋》与正名主义	152
四、《春秋》之微言大义	157
第六节 结论	160
一、时中的孔子	160
二、孔子之人格	165
三、孔门弟子及后学	169
第五章 墨子	173
第一节 总论	173
一、墨子之生地及年代	173
二、墨子的环境及其学说渊源	175
三、《墨子》书	178

第二节 墨学之根本观念:兼爱	180
第三节 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	186
第四节 墨子之宗教思想	195
第五节 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	204
第六节 实行的墨家	207
第七节 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	213
一、《墨经》与《墨辩》	213
二、墨家之知识论	214
三、论理学的界说及其用语	220
四、论理的方式	228
五、论理的法则	231
六、其他科学	246
第八节 结论	251
附录一 墨者及墨学别派	256
附录二 墨子年代考	260
附录三 《墨子学案》自叙	264
附录四 《墨子学案》第二自序	265
 第六章 三圣以后学派概观	 268
第一节 总论	268
第二节 老子所衍生之学派	269
一、关尹 列御寇	269
二、杨朱	270
三、庄子	275

六、乐	120
七、名	122
八、性命	125
九、鬼神祭祀	128
第四节 孔子之哲理论与《易》	130
一、易体	131
二、卦与象	134
三、爻与辞	137
四、繁变与易简	142
第五节 孔子之政治论与《春秋》	145
一、大同与小康	145
二、《春秋》的性质	148
三、《春秋》与正名主义	152
四、《春秋》之微言大义	157
第六节 结论	160
一、时中的孔子	160
二、孔子之人格	165
三、孔门弟子及后学	169
第五章 墨子	173
第一节 总论	173
一、墨子之生地及年代	173
二、墨子的环境及其学说渊源	175
三、《墨子》书	178

四、慎到及彭蒙、田骈	290
五、屈原	294
第三节 孔子所衍生之学派	299
一、略论	299
二、孟子	301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315

导读：

“失而复得”的《国学小史》

夏晓虹

梁启超与清华渊源甚深，久已为大众知晓。尤其是晚年作为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执教研究院国学门（一般称为“国学院”），更成就了一段学界传奇。而察其最初因缘，则可追溯到1914年。

当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清华发表了题为“君子”的演说，其中以《周易》乾坤二卦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解说“君子之义”，以为清华学子“崇德修学”^①之进境，后竟得沿用为清华校训。是月30日，为写作《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因“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又特意借居僻处西郊的清华学校。12月9日书成后，曾作《甲寅冬假馆著书于西郊之清华学校，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长诗一首，以记其事。据梁自述，著作期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颇得学生欢迎，所谓“听者娓娓不倦，若相说以解”^②。这或者可算是梁启超第一次在清华讲学。但查阅《清华周

① 达述意：《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② 梁启超：《第二自序》，《欧洲战役史论》，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卷首第3、4页。长诗初刊1914年12月15日《清华周刊》第25期，手迹亦载《欧洲战役史论》卷首。梁启超来校时间，则据1914年12月8日《清华周刊》第24期所刊《欢迎嘉宾》的“校闻”。

刊》，可知此回以“欧洲战争”为题的讲演，仅在12月9日、11日举行了两次^①；且一战刚刚开始，梁的“史论”其实更近“时事”，而与纯粹学术性的讲演有别。若以此标准衡量，《国学小史》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国学小史》的演讲与讲义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归来。按照在欧洲时与诸同人商讨的方针，“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因而，除去个人著述，梁启超也开始聚合同志，“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兴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亦将出游前的家庭讲学扩展至学校。^③

实际上，梁启超一行尚在归途中，与其一道出游、却暂留德国的张君勱已向国内同人写信报告“在欧所商”五事，其一即为“大学”问题。不过，张的意见是，因人才不足分配，故“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更合算。准此，张君勱认为，梁启超若能“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④而同游者蒋百里也希望推出梁氏讲学，并与已经在上海着手进行的改

① 《演讲战争》，《清华周刊》第25期，1914年12月15日。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6页。

③ 参见笔者：《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中正汉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1920年1月1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6—897页。

造中国公学事合并考虑，具体设想为，“弟以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①可见，无论选地在北方抑或南方，梁启超进入大学讲学已是同人间一致的主张。

至于梁启超第一次成规模的讲学设定在清华学校，既有定居天津的地理之便，也与1914年假馆清华近一月，留下了格外美好的印象有关。风景固然值得留恋，“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远离尘嚣；校风更得其赞赏，谓为“严整活泼，为国中所希见”，故“一诣兹校，则常览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涘也”。以梁之“爱悦兹校之诚，乃至不能自名状”^②的前缘，当清华校方发出邀请之际，任公先生自会爽快应承。

不过，这一展示梁启超由政治家向学者生涯转化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史料翔实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却少有所缺失了。1920年项下未曾记载，次年也仅在提及《墨子学案》一书的撰写与出版时顺便说明，“是书系由先生去冬在清华学校所讲《国学小史》讲义之一部删订而成者”^③。而此说乃是根据梁氏《墨子学案·自叙》中所言，“去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④而来。至于此次演讲的详细情况，尚有赖其他资料的揭示。

检索《清华周刊》，可在第200期上见到一则《名人将来校演讲》的“校闻”：

① 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1920年约10月间），《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4页。

② 梁启超：《第二自序》，《欧洲战役史论》，卷首第4页；《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毕业纪念册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9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6页。

④ 《〈墨子学案〉自叙》，本书第264页。